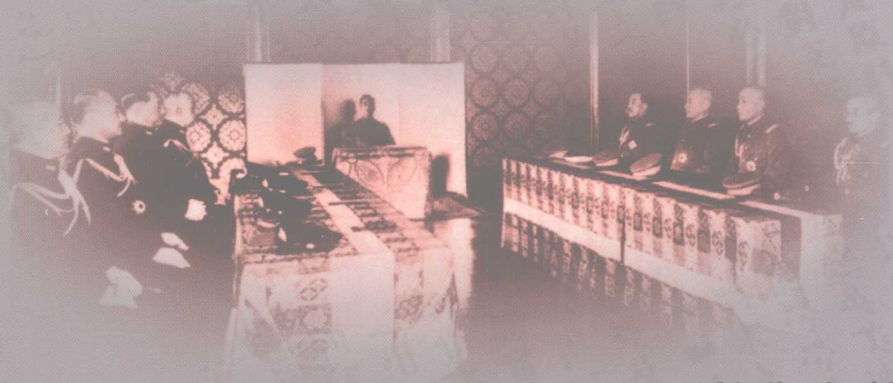


渠长根 著

日本侵华思想探源



新华出版社

渠长根 著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 探源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渠长根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11-8635-8

I. 日… II. 渠… III. 日本—侵华—研究 IV. K26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6228 号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

作 者: 渠长根

责任编辑: 朱思明

封面设计: 伍民力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aapub.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8635-8

定 价: 20.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9580863

序 言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是与日本侵华历史过程紧密相连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层面。它反映了近代日本向中国侵略扩张的思想轨迹、精神指导和理论背景，揭示了日本侵华的隐性结构和意识形态。研究日本侵华思想理论主要是系统回答日本侵华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为什么”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回答“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重要依托和必然深化、拓展，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当然，对于开拓、发展良好的中日关系，也不无启迪。

长根同志开始涉猎日本侵华思想理论问题已经有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了。记得他最早触及这一研究课题还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作为导师，指导他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和未来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战略定位，热情地建议他从日本侵华思想理论问题深入下去。在经过多次商讨之后，他最终摆脱了犹豫，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作了一系列的准备，甚至还草拟了学位论文的写作大纲。但是，由于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在与校内外多位同行专家沟通之后，他暂时放弃了这个选择，主要是考虑到对他而言还有更合适的选择。但是，在准备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兴趣却始终没有被淡忘，以至于在博士学位毕业之后的数年间，他一直坚持着，扎扎实实地开展了专题研究，并从对日本侵华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各界头面人物的个案研究中坚定了当初的选择和志趣。当然，这样的努力也进

一步给了他更多的信心和鼓舞。记得第一次公开发表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的成果是在2004年，当时我们一起去山东威海参加“纪念甲午战争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长根同志向大会提交了《幕末、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检证——从另一个角度看甲午战争的因与果》的研究成果。这篇论文引起了大会主办方的关注，他们特意安排他作为向大会作重点报告的十个代表之一登台，大概也就是从此开始，他的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之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十几篇相关的研究论文。据我所知，在繁重的日常教学工作中，他始终在坚持着去做，通过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不断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他曾经到广东、河南、浙江、上海和山东作过类似的学术讲演或学术研讨，也曾因此接受过《浙江日报》的专题采访。听到这些消息，作为他的导师，我颇为欣慰。一方面是高兴他在选择的研究领域里一直努力着，探索着，并不断有成果面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很重视与学术界的互动和交流，经常向老一代的专家学者和对日本侵华历史学有专长、研有硕果的同行请教，表现出一个成长中的青年学者必备的学术素养。

长根同志从上海毕业后到了浙江，继续从事高等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且兴趣逐步地扩展到中日关系研究领域。我注意到最近几年里他在中日关系研究上所付出的勤奋努力，了解到他经常在省内外的高校、研究部门作相关的学术报告。这又是一件令人宽慰的事情，毕竟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学术成长要在积累中进步、在深化中延伸。由此，我也相信并祝福长根同志在学术研究中成长得更快、进步得更快。

长根同志的这部作品立意高、选题新，虽然都是关于日本侵华历史研究、近现代中日关系研究的题材，但是它不同于传统的日本军国主义研究、法西斯主义研究，也不同于常规的日本侵华史研究，而是具有独到的视角和出发点。以代表人物为核心，深入挖掘、缜密剖析，梳理出存在于日本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军界、政界和财界等的侵华思想理论，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侵华中另一个更为隐蔽的层面。从整个结构上看，这部作品回溯很远，直到中世纪的安土桃山时代，从丰臣秀吉谈起，然后沿着日本近现代史的演变，经过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直到今天的平成时期，历史跨度很长。所以，这个梳理的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自然也是深入翔实的。在此基础上，把人物置放在日本的社会历史变迁中，挖掘、揭批其精神意识和思想学说中的侵略扩张成分，继之又以专制天皇制、政治谋杀和民族优越感为焦点，把日本社会潜伏暗藏的侵华思想理论提取出来，这的确是一个对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视野拓展和深度开掘，值得肯定，也显示了一种知难而进的学术勇气。至于对前些年紧张的中日关系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的整理分析，也是颇富新意的。

然而，大概正是因为如此，这样的专题性研究也就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确定冈村宁次、石原莞尔、岸信介、福泽谕吉、北一辉等这些人物为代表是否恰当，他们能否称得上是当时所在领域里的关键人物、头面人物，他们的思想是否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而且，以这些代表人物为主展开讨论，会不会疏忽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里其他多种人群的思想言论，会不会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等等，这些疑问让人读后心存。对

此，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安排呢？有！我想，长根同志如果能够在这部作品付梓之后，循着这个思路，坚持不懈地去搜罗更多更新的史料，开展更扎实的研究，日本侵华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会有一个更好的成果的。那样，不仅有利于我们反击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也有助于我们发展良好的中日国家关系。

谢俊美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导）

2008年初春时节于上海

前 言（代自序）

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在我国的史学研究中还比较薄弱，尽管有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缺陷。之所以如此，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语言障碍。研究这一课题，必须接触大量的日文资料，这是决定课题研究深度和严谨度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也是贯彻“论从史出、理由事生”的史学研究规范的重要要求。如果只是依赖现有的翻译文献，不仅丰富性、广泛性很有限，而且有准确度、可信性的疑问。这一点使一部分年轻的学者望洋兴叹、知难而退了。而老一辈的学者虽然都有可堪为范的学术修养和很深的日文功底，也在曾经付出的艰辛中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但是，他们毕竟年事已高，无论在精力还是时间上，都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二是我国目前所有的涉及这一课题的资料非常稀缺，而且，其绝大部分是属于1949年以前的，保管、整理之，有技术上的难题及其他制约因素，收集、利用也不通畅，比如繁体字问题、语言习惯问题等。即便如此，它们还都孤寂地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极少的几个中心城市里，有限的科研经费又使很多学者不得不“忍痛割爱”，望而却步或者浅尝辄止。另外一个越来越突显的原因，可能是纷杂的社会环境的干扰——急功近利的世俗标准和价值取向让一些学者难以静耐治学的清冷与落寞，何况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爬梳故纸才能完成的项目。

其实，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研究日本侵华思想理论问题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至少具有历史、学术的意义和政治、外交的价值。

第一，这是学术研究、解决问题之基本逻辑的实际运用。讨论任何问题必须弄清楚它的产生发展、原因本质、结果影响等最基本的构成元素，在提出问题后，深入分析直至解决之，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和环节，该问题的研究都是不完整、不周严的（不排除在具体的某些方面会有轻重缓急的差异）。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学术的生命力所在。相反，只看到问题的过程、结果与影响，即使它们极其复杂、严重，是务必给予密切关注的，然而就此停滞不前，淡忘事情的根源和初始，不去追究问题的起因和缘由，更莫说是刻意的回避，都是不严谨的，是有违于治学的宗旨与价值的。日本侵华问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学术研究的客体，从民族感情和民族责任出发，中国学者已经做了可堪告慰抗日英灵和死难者亡灵的理论工作，业已清晰地描述出日本侵华的政策指导和野蛮过程以及带给中国人民的刻骨铭心的深重灾难。然而，实事求是地看，我们还不能充满信心地说已经弄清了日本侵华的来龙去脉，尽管基本上做到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却几乎没有开始。因此，彻底弄清楚日本侵华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储备，就成为“解决问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个制约其后的先期程序。

第二，战争反思的基本功。在感情与理智上，任何一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结束之后，双方都要进行回顾、反思，即使各自的动机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对于被侵略者而言，一方面会不自觉地抚摸、咀嚼挨打的伤疤与痛苦，从而激起难耐的仇恨和雪耻的矢志。这似乎是人之常情。但是，必须说：如此对待被欺侮的过去，并非明智、冷静——疗伤之后，痛定思痛，还必须去整理、发现自己受辱的原因，特别是侵略者加害于己的原因。挨打固然值得同情，受辱更应该觉醒；受辱固然可悲，受辱之后竟不知为何受辱才

是真正的可悲。这是知己知彼的辩证法。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民族，要想不再重复地被欺受辱，忍痛理清曾经欺辱过自己的对方的所思所想，包括那些或散乱或系统的侵略思想理论，就显得尤其重要和急迫。

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数十年里，的确炮制、兜售过一系列的侵略思想理论，有的还非常精致。如源于幕府末期一脉相承的“大陆思想”，吞并中国的“东亚联盟论”“宇内混同说”“大东合邦论”，转嫁灾祸于他人的“补偿论”，称霸世界的“大东亚共荣圈论”，涂脂抹粉、极力辩解的“解放亚洲论”“自卫自保论”等等，前后相继，不绝于耳。在战争中，这些思想理论既是号召民众的旗帜、动力，又是扩大侵略的借口和根据；不仅驱使了本国民众奔赴战场，甚至让一部分被侵略的中国民众也为之蒙蔽。其蛊惑性、煽动性、欺骗性是不容置疑的。尽管侵略战争已经过去很久，但是，作为受害者我们必须全面地清楚、熟悉并牢记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论，也是历史进一步发展的要求。

第三，清算日本侵华战争罪责^①的需要。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责任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无论是在物质形态上，还是在国家关系、民族体认上，更不要说在思想意识和精神领域里。清算日本侵华战争责任是一项长期、艰难而又复杂的历史课题。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的国家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和发展，但是，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中国所面对的众多双边国家关系中也不是最良性化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识，说到底也就是对战争责任的清算问题的阻碍。众所周知，中日两国对那场战争的认识在很多方面逐渐取得了共识，并且体现、落实在两国之间的或其各自的有关政治文件

① 战争清算是中日双方的事情。当我们一方面致力于中日友好，并寻求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之路的时候，日本保守势力却反过来指责中国，甚至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历史教育。这实在令人费解。比如，2004年8月的那场亚洲杯决赛尽管早已结束，但被注入太多体育之外因素的比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争论并没有随即落下帷幕。8日，日本的报纸及电视大都喋喋不休地怒声讨伐中国球迷的“无礼”和“低素质”，并别有用心地质疑中国是否具有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能力，同时按照自己的逻辑探究中国国民反日情绪的根源所在。《读卖新闻》发表的文章更是荒诞地指责说：“中方把球迷骚乱问题政治化的责任归咎于日方，并强调反日的根源是历史问题。如果中国固执己见，则根本无助于消除国内反日的火种。”该报坚持认为，目前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根源在于“反日爱国教育”。之前，该报曾在5日以《“爱国”教育催生的反日民族主义》为题发表社论，批评说：“狭隘的国家主义是中国政府自己培育出的产物。”社论还称，中国国内的反日情感高涨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中国政府借1995年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展开了大规模的旨在“爱国团结”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活动”，当时媒体大量报道旧日本军队的侵略及残忍暴行，并以此将“反日”作为爱国教育的基调。与此类似，在日本，还有一些奇谈怪论潜伏暗藏着，诱拐着中日两国的对视和对话。清理之，也依然需要时日和耐心。

里。然而，日本远未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慎重态度认真清算过历史，也未真诚地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道歉，民间的认识和沟通也因此受到严重的制约和影响，以至于在 21 世纪初的几年里日本政治表现出十分浓厚的右倾、保守趋势。这种状况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未能获得积极的健康的环境，并最终演变出战后罕见的两国邦交关系的冰点极限。研究日本侵华的思想理论，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认清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责。

清算战争罪责，需要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则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参与。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着手，全面把握日本侵华思想理论应当说是一个独特的方位，具有特殊的优势——可以更加深入、全面地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的行动过程，更加透彻、准确地揭露侵华战争的思想根源，更加真实、有力地解释日本侵略者的野蛮与残暴。进一步说，弄清日本侵华的思想根源和精神动力，就可以在源头上把握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行径与流程，可以在起始位置阐明日本民众积极参与侵略战争的动机与意念。本源找到了，枝节和潮流便可顺利得以解析，彻底清算战争罪责自然也就有了可缘之木，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维护历史正义就有了强有力的武器。

例如，对于日本国民在侵华战争中的表现，一般都认为日本人民也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但是，现在再来分析史料，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①开始后，日本人民便配合政府的‘行政指导’，与政府合力共守日本人自己的‘私益’。日本人所说的‘公益’在很大程度上是掩盖自己‘私益’真面目的幌子。而且，排外的感情和自我独善主义的情绪于今犹存。日本的对军国主

^①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始于 1937 年。

义的批判只是针对一小部分军部势力的，而完全没有自我责备之意。”^① 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侵华战争过去了很长时间，日本从不能心悦诚服地痛彻反省、检讨自己的战争罪责，跟国民的思想积淀和情结有扯不断的连接。从启发日本的民族犯罪感、耻辱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彻底同军国主义决裂的意义上说，从日本民族的自我珍重、健康发展的意义上讲，认真研究1945年以前以至于今或显存或暗藏的日本侵华思想理论，已经到了不能再推迟、回避的时候了。

而且，根据国际法的相关原理，战争责任的清算是复合型、多方面的。物资的清算往往以战争赔款的方式进行，对此，中日两国政府已经以中国政府主动放弃的形式解决了其中的一部分——政府间的战争赔偿。但是，民间的赔偿刚刚启动，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②。战争的一系列遗留问题如慰安妇问题、教科书问题、档案问题等也在艰难的解决过程中。诸如此类，这些其实都是外在形态的、现象性的、相对而言较容易解决的。战争清算中最根本的是对挑起和指导侵略战争的思想理论的批判和唾弃，是在整个民族、政府、国民的意识形态和心灵深处对侵略罪行的忏悔和道歉，是最终落实在国家政策、国民教育、民族自觉中的反省和悔悟。关于这一点，日本做得还远远不够，消极被动，肤浅差强，甚至在一些情况

① [日] 中村哲夫：《对近卫内阁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管见》，《民国档案》1998年第1期。

② 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可参阅（1）李正堂：《中国人关注的话题：战争索赔》，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2）杨栋梁：《日本的战争赔偿》，《日本研究》1995年第3期；（3）[日] 中村隆英：《昭和和经济史》，岩波书店1989年版；（4）[日] 大藏省财政史室：《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3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版等。这些文论作品对该问题的讨论角度不同，但为我们提供的史料颇为丰富。

下给人以口是心非、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感觉。这是令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一切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和民众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继续清算日本的侵华战争责任，从今以后将集中在深层的思想意识层面上，主要就是集中在对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清理、批判上，而且，它还会成为一块重要的试金石，检测日本对侵华战争责任进行清算的态度和行动。

因此，当我们面对日本日益严重的右倾政治态势，在进行反驳和批判时，包括在为此进行政府交涉时，虽然正义在握、理直气壮，但总有某些力不从心的感觉。通过整理日本侵华思想理论，从侵华战争的根源上批判和警告日本右倾势力，对促使日本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不无帮助作用。

第四，为发展良好的中日国家关系清理障碍，寻找出路。中日国家关系是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最重要的双边国家关系之一，由于地缘政治的特殊性，发展相互关系对中日两国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珍重邦交正常化以来 30 年尚且顺利的邦交关系是摆在两国政府和国民面前的重大课题。研究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最终目的和最大效应还在于为发展友好的中日两国关系服务，推动中日两国在和平友好的环境和氛围中消除战争的阴影，远离战争，走上“永远不再战”的道路。现在，中日双方都很清楚，制约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不利因素中最突出、最敏感、最艰难的就是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认识问题，或者说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迄今为止仍然未能心悦诚服而持之以恒地坚持世界公认的侵略战争史观问题。客观地看，在处理两国关系时，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融入了诸多情感的色彩，民间如此，政府之间未尝不是这样。但是，作为受害者，中国的处事之道无可厚非；作为加害方，日本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的一些言行似乎也难苛求。对于那段被侵略的屈辱历史，中国必须坚

持原则，把它视为处理中日关系时的一个历史因素和历史背景，而且要增强针对性，减少盲目性，真正时刻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因此，抓紧时间系统整理近百年来日本的侵华思想理论，就同时有了史学的意义和政治学的价值。

最近这些年，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势力正在抬头，有些时候还相当猖獗。而且战后至今，日本国家政治的右倾化趋势越来越明显^①。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对于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趋向来说，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故弄玄虚。回顾历史，爬梳那段被侵略的痛苦经历，总结日本为祸中国的深层理念和民族性的思想，对于鉴别、处理新生的军国主义还有着现实的工具性和坐标意义。

研究日本侵华思想理论至少要实现两个突破。

第一，方法与手段的突破。整理近代史上对日本侵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政治家、官僚、财阀、军阀等日本社会各界制造、散布的侵华言论及其作品，爬梳、理清各种侵华思想理论从散乱到系统、从自发到自觉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把纷繁复杂的日本侵华思想理论归纳起来，述其全貌，并阐述其实质。与此同时，借鉴、吸收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研究中富有价值的成果，包括从中获取在我国根本无法得到的第一手材料。尽管其内容大多是反动的、令人厌恶的，但却是非常珍贵的文本载体。与此同时，整理 1949 年以前不同时期的中国政府、学者及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对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思考和把握结论，尤

^① 关于日本右翼势力问题的研究，是我国日本问题研究领域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常规性课题。一直以来，学术活动相当活跃，成果也十分丰富，可谓硕果累累。中国抗日战争学会何理先生主持完成的重大研究项目《日本右翼势力研究》为多年来的深入研究作了一个有益的总结。

其是在进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的感性认识。把身处战争灾难之中的中国人的感觉和认识提炼出来，汇聚在一起，以此勾勒较为直观、可信的被侵略的历史体认。另外，也坚持整理港澳台地区和英美等西方国家专家学者在不同学科领域对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研究成果。

在方法上，既论述精神层面的日本侵华思想理论，又紧密联系日本侵华的历史活动，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确，日本侵华思想理论不是凭空杜撰的，也不是某些人封闭的思维活动，而是来自于日本自幕府末期即开始的对外扩张，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愈演愈烈的侵华活动。在侵略战争中，这些思想理论又得到进一步的修正、充实和完整化。立足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发现在社会各界生发、流传的侵略思想，检索、验证侵略活动与侵略思想互动、共动的轨迹，最后清理出隐藏在侵略战争背后或者已经演化成国家政策和民族心理、社会思潮、文化惯性的侵华思想与理论。

第二，体例与结构上的突破。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不同于宏观的日本近现代史研究包括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也不同于军国主义研究和法西斯主义研究^①，甚至不同于日本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研究，更不同于日本侵华政策研究和侵华过程研究。它是立足日本侵华的历史过程，从指导、决定日本侵华历史活动的思想精神

^① 目前，国内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业已取得丰富的成果，这是在两个特殊而又传统的角度的专题深入研究。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完成的重大研究项目《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形成了一个关于日本军国主义问题的集结式研究。该院日本研究所的蒋立峰等人作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另外，还有杨宁一的《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层面研究日本侵华的思想理论学说，揭示其酝酿、制造、宣传与实践化的动态轨迹，阐明其帝国主义的实质，并展现其与具体侵华活动的双向关系。

但是，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也有相当的难度，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是会遇到制约的。其一，在客观上，国内尚无此问题的全景式系统研究，可供借鉴的成果和资料有限。如前所述，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研究在我国史学研究中基本上是个空白。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语言问题、前期积累问题、社会环境问题等。另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侵华的历史过去得越来越久，当事人年事已高，将渐渐地离开这个社会 and 时代，第一手材料越来越少，日渐难寻，即使是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新型的历史记录和史学研究方式，其机会也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确立这个研究课题不仅带有“吃螃蟹”的风险，还必须继续面临原始资料缺乏、新的来源不畅等先天不足的困扰。其二，在主观上，构建、写作大规模高质量专题研究成果的学术功底薄弱。史学研究是一个严谨、务实的学术领域，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很高。关于日本侵华思想理论问题，尽管笔者关注得较早，做了一系列扎实的准备工作的，并尝试着写作、发表过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系统的史学训练和修养是终身的、渐进的，自觉与深入、翔实的规模研究和深度研究还有一定的差距。